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1.011

助益青年人文坛 ——兼考现代作家沈从文编辑之路

蒋士美

(湖南理工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6)

摘 要: 沈从文既是知名的现代作家, 亦是出色的报刊编辑, 其一生参与编辑的正式刊物计 20 种, 且多为主编。考察沈从文的编辑活动史, 尤其是他任主编期间所刊发文章的核心作家群体, 可以发现, 他对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尤其是来自大学校园的文学新秀)情有独钟、青眼相加。沈从文如此大力培养提携青年作家, 与他的文学理想与美学追求密不可分, 背后饱含着他深刻的“五四情结”和文学革命思想, 寄托了他重造文学经典与民族品格, 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 沈从文; 报刊编辑; 青年作家; 文学理想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1-0086-09

Helping Young People Enter the Literary World: Examining the Editing Path of Modern Writer Shen Congwen

JIANG Shim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414006, China)

Abstract: Shen Congwen is not only a well-known modern writer, but also an outstanding newspaper editor. Throughout his life, he edited 20 official publications, for most of which he acted as the chief editor. After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Shen Congwen's editorial activities, and especially the core group of writers who published articles during his tenure as editor in chief, it can be found that he has a special fondness for young writers who have just entered the literary world, especially literary newcomers from university campuses. Shen Congwen's strong efforts in cultivating and promoting young write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 literary ideals and aesthetic pursuits. Behind them lies a profound "May Fourth Complex" and literary revolutionary ideas, embodying his desire to rebuild literary classics and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us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Keywords: Shen Congwen; editor of newspapers; young writers; literary ideals

收稿日期: 2023-08-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沈从文‘自我经典化’研究”(23YJC751008);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沈从文‘自我经典化’路径研究”(22YBA171)

作者简介: 蒋士美, 男, 湖北宜昌人, 湖南理工学院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地理学。

近现代以来，中国报刊行业飞速发展，并以其特有的发行量大、购买方便、传播迅速、社会影响力广等特点，强力助推了文学事业的兴盛与繁荣。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可以发现，许多负有盛名的大作家同时也是出色的报刊编辑，如鲁迅、徐志摩、郁达夫、茅盾、丁玲等等皆是如此。当然，作为编辑的沈从文同样不能忽略，其编辑经历即便和他的创作经历相比，也毫不逊色。从1928年编辑《中央日报·红与黑》开始，沈从文一生参与编辑的刊物近20种，且多为主编。他以报刊为工具和载体，一方面大力宣扬自己的文学理想与美学追求，另一方面悉心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成绩卓著。1946年9月，沈从文在《怎样办好一份好报纸——从昆明的报纸谈起》一文中说：“从五四起始，近二十五年新闻纸上的副刊，即有个光荣的过去，可以回溯。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而得到完全成功的。”^[1]显然，在沈从文的心目中，报纸上面的文学副刊栏目在思想重造、文学运动、文体创新、作家培养等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负有盛名的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编辑活动、编辑理念相较他人有何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与其文学观念有何内在关联？背后又潜藏着怎样的文学理想与人生图景？本文拟结合其编辑经历对此进行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编辑刊物：数量众多，种类多样

沈从文一生参与编辑的刊物数量众多、种类多样，但由于时间跨度长、部分资料散佚且已有的研究资料相互之间存在分歧，诸多具体的编辑细节至今尚未得到确证。有鉴于此，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资料（吴世勇《沈从文年谱》、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靡华菱《沈从文生平年表》、李端生《报刊情缘——沈从文编辑轨迹探迹》、彭慧芝《沈从文的编辑活动与1930——1940年代诗坛史料勾沉》）的基础之上，划分出1920年代、1930年代、1940年代三个历史时期，重新勾勒梳理沈从文一生的编辑活动。

（一）1920年代

1923年，“湘西王”陈渠珍在保靖县设立报馆，由沈从文负责《湘西永保龙桑凤乾绥古庸麻十县联合乡自治全案》《民治旬刊》《民治报——

半月刊》《乡政月刊》等刊物的文字校对工作，这是目前所见沈从文最早的编辑活动。

1928年初，沈从文经由水路从北京到达上海；其后不久，胡也频、丁玲也由杭州移居于此。本年7月19日，由国民党主办的上海《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创刊，因主编彭学沛与胡也频熟识，于是便约请胡、丁二人负责副刊的编辑和发稿事务，沈从文实际上也参与了相关的编辑工作（三人在北京时便是好友）。为了办刊方便，三人甚至还租住了上海萨坡赛路204号的一栋三层楼房共同生活。本年底，三人深感该报属于党派政治的喉舌，无法藉此传播自身的文学理念，经相互商量之后主动脱离副刊编务，《红与黑》也在出版至第49期时停刊。沈从文的本次编辑活动，前后持续了大约3个多月的时间。

1929年1月，因编辑《红与黑》副刊积累了一定的合作办刊经验，加之长期以来存有的编辑一份刊物的美好愿望，由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共同主编的文学刊物《红黑》月刊正式问世。沈从文撰写了发刊词，并在《红黑》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龙朱》。与此同时，三人还受人间书店委托，共同编辑了《人间》文学月刊。沈从文为《人间》创刊号撰写了卷首语，并在上面发表了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红黑》与《人间》完全是沈、胡、丁三人文学观念的具体体现，自面世起便展现出强烈的个人意志。其既不为政治服务，也不追逐商业利益，旨在寻求文学的“自由”与“独立”。这样的文学态度自然是弥足珍贵的，但也无形中将自己限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比如，在《红黑》杂志所发表的所有作品中，仅沈、胡、丁三人的作品便占据了3/4，这也直接导致了两个刊物的受众群体单调、市场狭窄。虽然三人为办刊费尽心力，但刊物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遭读者冷遇的结局。体现三人独特编辑理念的《红黑》与《人间》，在出版至第8期和第4期后，被迫从出版市场“出局”。作为两份纯文学刊物，《红黑》与《人间》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12期，在中国现代编辑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迹，其不但圆了沈、胡、丁三人的编辑梦想，也深化了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沈从文而言，这一段编辑经历为他以后从事编辑活动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二) 1930年代

1933年,受《大公报》经理胡政之邀请,杨振声和沈从文正式接替吴宓主编《文学副刊》,并在不久之后将其更名为《文艺副刊》。不过,由于当时杨振声把主要精力放在编辑教科书上面,所以《文艺副刊》实际上的主编是沈从文。沈从文编辑《文艺副刊》的方式与之前吴宓主编《文学副刊》时相同,都是在北平编好稿件,然后寄往天津报馆发排。

1933年9月23日,沈从文负责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期出刊,发表了沈从文自己的《记丁玲女士·跋》、岂明(周作人)的《猪鹿狸》、杨振声的《乞雨》、林徽因的《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倦》等作品。从1933年9月到1934年12月,《大公报·文艺副刊》每周出版两期(出版日固定在周三和周六),每期的篇幅为2/3个版面;从1935年1月开始则改为每周出版一期(出版日固定在周日),篇幅为一整个版面,一直出版到1935年8月下旬。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沈从文一人全权负责了《大公报·文艺副刊》所有的编辑出版事务。他不仅承担了为副刊组稿、写稿、编稿、发稿的任务,还亲自与投稿者沟通联系,发掘文学新人,培养年轻作家。

1935年9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与《小公园》合并为《大公报·文艺》,出版日期也改为每周一、三、五、日。其中,沈从文自己只负责主编周日出版的“星期天特刊”,周一、周三、周五的三版则由他亲自提携的年轻作家萧乾主编。从1936年4月开始,沈从文正式退居《大公报·文艺》幕后,不再负责副刊的具体编辑工作,而是放手让萧乾单独署名发稿,自己充当顾问。藉由《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大公报·文艺》,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报刊编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以此为平台托起了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京派”作家群。虽然沈从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栏目的时间不足3年,但创造了非凡的业绩,这无疑是其整个编辑生涯之中最为辉煌灿烂的一个时期。

除了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外,沈从文在1930年代还有其他众多编辑活动。这些活动相较《大公报》文艺副刊而言或许零散不成系统,成绩也算不上突出,但沈从文同样用心对待,因而

不可忽略。兹列举如下:

1932年10月15日,沈从文与林康、高植、程一戎合编的《小说月刊》创刊,该刊由杭州苍山书店发行,发行至第5期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沈从文为《小说月刊》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辞》(无署名)和《编后》(署名编者之丙)。

1934年10月10日,由沈从文、郑振铎、巴金、李健吾任编委,靳以、卞之琳负责编辑的《水星》月刊创刊,由北京文华书局发行。沈从文的主要任务是为该刊提供办刊指导,联系优质稿件,并亲自撰稿,他在这个刊物上共发表了10余篇作品。《水星》月刊一共只出了9期,于1935年6月停刊。

1937年5月1日,由朱光潜主编,沈从文与杨振声、俞平伯、朱自清、周作人、林徽因任编委的《文学杂志》创刊,沈从文具体参与小说稿件的审阅选用工作,并在该刊发表了3篇小说和1篇文论。该刊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因抗战爆发仅仅出到第4期便被迫停刊。

1939年1月1日,由西南联大同人创办,陈岱孙、潘光旦等人具体负责的昆明《今日评论》周刊创刊,沈从文负责文艺类稿件的编辑工作,并以此为阵地推介了李霖灿、汪曾祺等一大批文学新秀。

1939年5月15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创刊,由沈从文推荐的西南联大学生程应镠主编,沈从文也亲自为该刊写稿、荐稿、改稿。

(三) 1940年代

1940年4月1日,由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人编辑的《战国策》半月刊创刊。《战国策》由于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因而在当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该刊于1941年7月停刊,共出刊17期。沈从文因参与编辑《战国策》,在当时和后来遭到了文坛舆论的批评乃至围攻,许多沈从文研究者出于种种原因,对此讳莫如深。《沈从文年谱》编者吴世勇根据资料考证,证实沈从文确实参与了《战国策》的编辑工作,主要负责编辑文艺类稿件,但吴世勇同时也强调,不能仅仅因为沈从文参与编辑并为之撰稿就将之归入“战国策派”。

1940年6月16日,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浦江清主编的一份面向中学生的辅导性读物——《国文月刊》创刊,沈从文从1942年开始在该刊担任编委,同时还兼任编辑工作,并在该刊第1、

2、3期以《习作举例》为题发表3篇文章。

1945年2月下旬，昆明《观察报》邀请沈从文主编该报副刊《生活风》。《生活风》一天一刊，共出版了70期。从5月11日开始，《生活风》更名为《新希望》，依然由沈从文主编，但他同时邀请了在云南大学任教的程应镠参与到副刊《新希望》的编辑工作之中。在主编《观察报》副刊时，沈从文提出了明确的编辑思路，反对在选稿用稿过程中一味以取悦读者为目的，提出要注意培育新人、奖掖新作。因此，主编《观察报》副刊也成为了沈从文编辑活动中的一个亮点。

1946年5月，随着抗战胜利后时局的变化，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结束特殊时期办学历史，三大联合力量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准备重返京津，被续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沈从文也于月末回到北平。这一时期，在讲课与创作之余，沈从文为编辑各类报刊投入巨大心血，编辑报刊种类多、时间长，是其编辑生涯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

1946年8月底，参编由杨振声在北平主编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并于同年9月1日在该刊发表《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一文。

1946年9月，应邀和杨振声、冯至主持编辑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该刊10月13日出第1期，每周一期，1949年1月2日出版至112期时停刊。

1946年9月中旬，开始参加杨振声主编的北平《益世报·文艺周刊》的编辑工作。该刊在新闻史上有较大影响，周恩来曾受聘该报特约通讯员，并为之撰写旅欧通信50余篇。

1946年10月13日，接任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0期的主编，发表编者言《〈文学周刊〉开张》，表明自己接办该刊的态度和主张。10月20日，在《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1期作《编者言》，表示编此副刊“只是期望它能名副其实，可望像个‘文学副刊’”^[2]。该副刊在编至1948年11月8日第118期时，因战事压缩版面而停刊。

1946年12月29日，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创刊，经萧离介绍，沈从文任主编。刊物实际上由沈从文与其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周定一共同负责。副刊共出100期，解放前期停刊。

1947年6月1日，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在北京复刊，沈从文参与编辑。该刊共出18期，

1948年11月停刊。

1947年10月20日，北平《益世报》的《诗与文》创刊，沈从文任主编之一。《益世报》由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雷鸣远于1915年创办，影响仅次于《大公报》，该刊于1949年停刊。

综上所述，自1928年参与编辑《中央日报·红与黑》开始，到1949年1月底退出《益世报·诗与文》的编辑工作为止，沈从文在这20余年的时间里，以一丝不苟的作风、与众不同的理念、提携后进的态度，累计参与编辑大小刊物20种（如表1所示）。他不但为繁荣现代中国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也以刊物为平台培养了一大批知名作家，最终奠定了自己在编辑出版行业的重要位置。

表1 沈从文编辑简史

时间区间	刊物名称	角色	参编时间
1920年代	陈渠珍报馆	编辑	1923
	中央日报·红与黑	编辑	1928
	红黑	编辑	1929
	人间	主编	1929
	诗刊	编辑	1931
1930年代	小说月刊	主编	1932
	大公报·文艺副刊	主编	1933
	水星	编辑	1934
	大公报·文艺	主编	1935
	文学杂志	编辑	1937
	今日评论	编辑	1939
	中央日报·平明	编辑	1939
	战国策	编辑	1940
	国文月刊	编委	1940
	观察报·新希望	主编	1945
1940年代	经世日报·文艺周刊	编辑	1946
	大公报·星期文艺	主编	1946
	益世报·文学周刊	主编	1946
	平民日报·星期艺文	主编	1946
	文学杂志	编辑	1947
	益世报·诗与文	主编	1947

二、助益新人：设身处地，不遗余力

1934年，当已正式入主《大公报·文艺副刊》这一全国知名刊物的沈从文回首过往，他肯定无法忘记，10年前自己初涉文坛以无名作者身份投稿之时所遭遇的尴尬处境与切肤之痛——《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当众将他的稿件揉成一团，弃如敝履，言语之中尽是讥嘲。若非随后胡适、徐

志摩、郁达夫等人的无私提携,他或许永远都只是一名蜗居在“窄而霉斋”黯然写作的食不果腹者。因此,当10年后成为名刊主编的沈从文,对于那些初入文坛的青年写作者内心的期待与盼望,自是心有戚戚焉,并由此将这种理解之同情化为真诚实际的鼓励、指导、提携与扶持,以避免自己当年的不幸遭遇在这些文学新人身上重演。在《记胡也频》一文中,他曾如此动情描述:“我还愿意给他们以一种‘自信’的机会,每一个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他们都得有一种自信。”^[3]在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及其它文学类刊物期间,沈从文始终不忘提携年轻的无名作家,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看稿、改稿并推荐发表,以增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自信和坚持。沈从文对待年轻人的这种态度,离不开徐志摩对他的影响,正如他在《答凌宇问》中谈及徐志摩时所言:“到我作《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时,对陌生作者的态度,即充分反映出他对我好的影响。”^[4]这里的“他”指的就是沈从文的文坛知音徐志摩。在沈从文的真诚鼓励、严厉要求和热心扶持之下,许多原本

籍籍无名的青年作者逐步成长为现当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大作家。本文在此选取沈从文主编时间最长的两份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和《益世报·文学周刊》)为主要研究史料,详细梳理其作者群体及发文次数,进而考察沈从文是如何借助副刊这一平台倾尽全力培养青年作家的。

(一) 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期的发文作者

自沈从文1934年完全接替吴宓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后,该刊的作者群体较之以往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他团结了一大批文坛名家比如周作人、杨振声、朱自清等,以严肃的文学态度继续推进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带动并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之中。对于文坛新秀如卞之琳、何其芳、萧乾等人,沈从文始终都是热忱以待。下面通过对沈从文所主编的166期《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撰稿者及发文量进行数据统计,可以直观呈现沈从文主导下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作家群体的结构特征(具体见表2)。

表2 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期撰稿者与发文量统计

发文量	撰稿者
39	卞之琳
33	沈从文、周作人
22	李健吾
18	李长之
15	萧乾
14	梁宗岱
10	陈梦家、林庚
9	林徽因、程万孚
8	孙毓棠、杨振声、俞平伯、邓叔存
7	罗暎
6	冰心、刘荣恩、孙洵侯、吴伯萧、芦焚、李广田
5	朱自清、凌叔华、曹葆华
4	胡适、黎锦熙、杜秦、刘茹、赵少侯、常风、蹇先艾、李威深、吴世昌
3	郑振铎、叶公超、陈铨、伯上、刘国平、靳以、何其芳、孙大雨、徐转蓬、刘祖春
2	朱光潜、梁思成、钱钟书、余上沅、包乾元、季羨林、巴金、老舍、高殿森、方玮德、莲生、张露薇、周煦良、南星、卢寿树、苏雪林、杨季康、张富岁、维亚、汪伟、徐芳、而始、傅彦长、殷炎、盛成、李苏菲、余冠英、宋翰迟、叶麀、纪戈云、杨宝琴、郑效洵、逸父
1	罗念生、闻一多、梁实秋、张天翼、张允和、施蛰存、废名、艾芜、沙汀、李影心、陈衡哲、饶孟侃、方令孺、侍桁、李辰冬、罗大纲、朱溪、陈飞马、张宗植、曹聚仁、缪崇群、闻国新、穆时英、前羽、闻家驷、李同念、洪深、周曙山、隽闻、郭绍虞、董作宾、郭源耕、梁梦回、又玄、天铎、茂青、甘运衡、林籁、叔文、吴异泽、彭丽天、刘也凡、居文、张骏祥、江泥、蔡尚思、西滢、龚泽锐、百里梅、知微、翟永坤、赵景深、心田、阿梨、鹤逸、蔽云、漆子、周辅成、李谭英、陆志韦、仲南、彭乔、李柯雷、黑婴、李青崖、英、祖文、寒谷、颜歆、莫辰、李达、菁、袁昌英、窘羊、熙、彭基相、采屏、陈燕霞、柳叶长青、张全恭、阜东

上表清晰地显示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作者群体非常庞大,共计158人;其中既有五四新文学的主将,也有保守派作家代表。作家结构也非常多样,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等,应有尽有。当然,这一撰稿群体最突出的特征,还是其主体多为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如果将1934年作为参照时间来看,发文最多的卞之琳生于1910年,当时不过24岁。除此之外,发文比较频繁的李健吾(生于1906年)、李长之(生于1910年)、萧乾(生于1910年)、林庚(生于1910年)、陈梦家(生于1911年)等等,当时都不过是20多岁的年轻人,都是初出茅庐的文学新秀。

(二) 沈从文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时期的发文作者

《益世报·文学周刊》是由比利时来华的天主

教徒在1915年创办的,其秉持“超政治、超阶级、超党派”的办刊理念,奉行自由主义的文学立场,这样的办刊理念及文学立场恰好与沈从文不谋而合。沈从文从1946年10月13日开始负责《益世报·文学周刊》的编辑工作,一直到1948年11月8日该刊停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共主编了118期刊物。统计相关史料可发现,该刊的撰稿作家计130余人,其中既有声名显赫的知名作家,如林徽因、卞之琳、朱自清、朱光潜、俞平伯、施蛰存、戴望舒等,也有初出茅庐的文学新秀,如穆旦、柯原、叶汝琰、李瑛、袁可嘉、郑敏、金隄、少若、汪曾祺等。这些作家将《文学周刊》当作战后文学复兴的阵地,为194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下面通过对沈从文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时期的撰稿者及发文量进行数据统计,简要说明其结构层次(具体见表3)。

表3 沈从文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时期撰稿者与发文量统计

发文量	撰稿者
26	沈从文、穆旦
18	柯原、叶汝琰、李瑛
15	袁可嘉
14	郑敏、金隄、黄永玉
12	王道乾
9	张白
8	少若、汪曾祺、若琚
7	萧望卿、顾元爽、赵全章
6	李影心、林徽因、秦朗
5	毕基初、盛澄华、郭士浩、王忠、王佐良、盛澄华
4	李长之、刘玉欣、陈占元、王连平、苏夫、陈大春
3	施松卿、朱自清、马文珍、灼人、杨龙章、陆白人、李霖灿、王逊、方域、金翎、常风、苏夫
2	林文铮、吴达元、何维尔、施蛰存、聂清、张秀亚、吕德申、朱光潜、孟广儒、唐绍法、张守常、高翊、亦明、陈焚、林庚、金翎、翟尔梅、王达人、曹皆明、王洪文
1	姚可昆、闻家驷、杜运燮、赵瑞霖、林如稷、林文静、友竹、北云、废名、彭皓、布德、流金、卢飞白、吴洁、傅庚生、方溥、曹汀、蒋敦、甘运衡、刘纪荃、齐翊文、郭戈、沈自敏、李长贤、哈玲、民夫、吴同宾、吕祖荫、戴望舒、王如霖、尹文津、艾子、李亦明、白卷、碧落、滇玉、邓华微、扇陀、高翔、邓华辉、丁瑜、卞之琳、王静、周珏良、生金、许志俭、苏铁、姜汎、楚天碧、邓嗣禹、齐香、张香远、林蒲、严文井、恩钿、亚珍、乐希、杨世福、钧若、曾是、李白凤、王运通、冯至、于文烈、谢伏琛、伏耀祖、章子长、许小梦、前人、刘希武、张英、沉重、欧洁芳、日风、俞平伯、若诚、程靖宇、欧阳金、叶雅、徐群、庞董渠、慕容丹、薛瑞娟、陈定民、一风、艾特、雷歌、李子光、穆施、石林、黄盛陆、靡芜、张书城、萧离、曾敖、成资、翰墨、青苗、萧沅、林娟、朱德熙、罗大冈

从表格所呈现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出,在沈从文主编时期的《益世报·文学周刊》的作者群体中,青年作家所占的比重仍然是最大的,发文数量排在前列的作家几乎全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沈从文自己除外),如果将1947年作为对比时间,则发文最多的穆旦1918年生,刚29岁;郑敏、汪

曾祺、袁可嘉、金隄、王道乾、少若(吴小如)、叶汝琰、黄永玉、李瑛等等都是刚刚20岁出头;柯原则更小,1931年出生的他才不过16岁而已。不过,这些青年作家年龄虽小,作品风格却颇为成熟老练,甚至还有读者来信指责编辑部总是刊登老成腐朽之作,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作者的年

龄实际上只有20岁左右。这种误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更像是对这些年轻作家的褒扬;从另一个侧面看,其实也是对编者沈从文选稿眼光的一种肯定。

(三) 发文作者群体简析

通过对几个副刊撰稿群体及发文量的数据统计与年龄结构分析,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主编系列文学副刊期间,沈从文着意提携的作者大多都是青年作家和文学新秀,尤其是初出茅庐的无名作家。具体而言,这种培养和扶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作为刊物主编,沈从文鼓励青年作家踊跃投稿,并选择其中的优秀作品进行修改、发表。对于年轻作者投递给自己的稿件,沈从文每一篇都会进行谨慎细致地处理,尤其是合乎自己心意的文章,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大的段落还是小的标点,他都会细细推敲修正,以求完美——“有的只稍作字句改换,有的地方则大拆大改,处处见出着手成春的功夫。”^[5]同时,他还会将经自己修改之后被采用的稿件悉数寄回给作者,那些修改稿上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融注了他对年轻作者的殷切关爱:“沈先生还把我的原稿寄回,我稿上有几个错别字都经他改正。后来我才知道所有排印了的稿件他都要寄回作者的。”^[6]即便是那些确定无法刊用的稿件,只要有可取之处的,沈从文都不会简单粗暴地将其弃之不顾,而是耐心地给投稿者回信说明情况——或是给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或是推荐到其它适宜的刊物发表。1930年代中期,文学青年严文井曾先后给沈从文投去多篇稿件,希望能得到认可并发表,沈从文特地致信给他,劝其写作时不要太过追求快速多产。虽然沈从文并没有采用严文井的文章,但却及时将这些文章转给了凌叔华等人主持的刊物,使其最终也得以成功发表。在回忆自己的创作与投稿经历时,严文井不无感慨地说道:“从文先生没有在他主编的刊物上采用我的文章,可是也没有枪毙它们。没过多久,我那些小文章就在萧乾和凌叔华主持的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这不用多想就能明白是经过谁的手转去的。”^[7]沈从文的爱才惜才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通过书信往来对青年作家的写作态度进行批评教育,或结合具体作品在写作技巧方面对

他们加以悉心指导。在《给李先生》的信中,沈从文强调一个好的写作者离不开生活阅历与人事体验的供养:“一个作者他的文章能写得很出色,并不仅是‘成天写’,或是‘欢喜文学’。他必须脑子里有许多可写的,充满了各方面的常识,对人事具透明的理解。”^[8]在给李寒谷寻求写作指导的回信中,他指出,诚实的写作态度和丰富的写作经验对于文学创作至为关键:“我们要终身忠实于写作,努力于写作。还有一层经验要多,写作经验极宝贵,它不能由任何人告诉你。”^[9]在审读灼人的抒情长诗之后,沈从文认为其文字处理尚未在传统与新语体文之间求得平衡,建议他多向徐志摩、朱湘、冯至、艾青等人学习,深入领会中国文体中简洁文格的变化与新诗之间有何内在关联。这些书信,通过《大公报·文艺》“废邮存底”和《益世周报·文学》“新废邮存底”登载后,正如沈从文多年后在自传中所言:“对国内一部分作者的写作,把握工作的单纯态度,是有过影响的。”^[10]此时的沈从文,既是刊物主编,又是声名煊赫的大作家,其“乡下人”的身份实际上已经一去不返,全然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身份过渡。藉由审阅、修改、刊发文章的途径与青年作家进行的深入交流,沈从文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

三、“五四情结”:变革社会,重造经典

沈从文在致柯原的信中曾经写道:“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廿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11]可见,由沈从文负责主编的文学副刊,其作家身份构成多为初入文坛的文学新秀。一如他在自己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一周年纪念时所言:“好几位少壮作家的作品,所得到的赞美,以及一年来的而惊人进步,使编者亦分有了光荣。”^[12]那么,沈从文为何如此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他着重培养的青年作家,为何大多都来自大学校园之中?

在《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一文中,沈从文指出:“一个优秀作家在年青读者间所保有的抽象势力,实际上就永远比居高位拥实权的人还大许

多。”^[13]而在《小说与社会》一文中，他同样强调“比我们更年轻一辈的国民，凡是受中等教育的，都乐意从一个小说接受作者的热诚健康人生观”^[14]。诸如此类话语表明，沈从文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文学在参与塑造青年的人生态度和情感结构方面意义重大，而青年在文学传播甚或经典生成过程中的能量亦不可小觑。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沈从文便非常注重与文学青年之间的交流互动，在各种文学对话的场域中也特地将青年设定为谈话对象。比如，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他预言青年学生会是自己作品的重要读者——“我敢说你们大多数是青年学生”^[15]，在《萧乾小说集题记》中也强调要“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16]。这些迹象说明，沈从文关注到了文学之于青年以及青年之于文学的重要意义。

1947年9月28日，沈从文在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第23期发表《致周定一先生》一文。他明确指出，当前缺少伟大中国文学作品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职业作家近二十年在写作上所形成的独占趋势，他人无从插手。二是正因为独占而无能，便不免将文学限于一种贫泛定型格式中。”^{[17]469-470}在沈从文看来，虽然大部分所谓的职业作家（主要是中老年作家）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创作成绩，也曾为社会的进步发展、文学的更新换代作出过重要贡献，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却容易被约定俗成的观念所困缚和限定而缺乏革新意识与进取精神，这个时候的他们想要写出伟大文学作品近乎痴人说梦。然而，他们出道早、作品多、名气大，占据着大量的社会关系与文学资源，把持着文坛话语权。这样的现状，一方面使得青年作家难有出头之日，容易遭遇打压和排挤；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文坛的死寂局面，使得文学技巧与文体形式的创新几无可能。如果一个国家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之中，那这种局面似乎也没什么大碍，但1940年代的中国却处于风云变幻的历史转折时期，迫切需要新鲜血液的输入，以加快整个民族的“新陈代谢”。这样的时代，呼唤雄健有力、勇敢真诚的青年少壮作家出现，并通过他们创作的优美、健康、深刻、激越而又宏伟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为死气沉沉的文坛赋予生机，为饱经风霜的民族带来希望。沈从文一贯认为，报刊在发掘青年作家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于是，

他在信中建议周定一办一个文学周刊，并向周定一推荐了一个普通人写文章的编辑：“XX过XX教书，经历强，兴趣好，对学生当然极有意义。若尚可编一个‘散文与诗’一类周刊，正可邀他帮忙。”^{[17]471}不仅如此，沈从文还进一步强调，一个有理想有眼光的报纸主持人，对于新作家的培育和文学上自由竞争传统制度的继续意义重大，可以帮助“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得到用笔的方便，于工作上容易有以自见”^{[17]472}。这显然是他担任编辑多年的经验之谈。

在沈从文主编的另一副刊《益世报·诗与文》上，他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年轻作家及其优秀作品的渴望。该刊创刊的本来想法即是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新诗实验的舞台，借此开拓新诗的技巧、形式，以生产出新鲜的独特之作。在第10期刊发的《新的开始》一文中，沈从文明确指出，副刊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其中一条重要的改进标准就是：不拜名家，重点采用年青人的有血有泪的作品。这样的办刊态度，为许多热爱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提供了展示自己的绝佳机会。如前所述，沈从文所主编文艺刊物的核心作家群体，多是默默无闻的青年文学新秀，如后来创作成绩斐然的穆旦、袁可嘉、郑敏、李瑛、柯原等人。

沈从文之所以重点选择大学校园里的文学爱好者进行精心指导，有其现实层面的考量。文学“不仅是表意的工具，更是承载思想的容器”^[18]。在《纪念五四》一文中，沈从文指出：“文运与大学一脱离，就与教育脱离，萎靡、堕落、无生气，都是应有结果。”^{[19]298-299}也就是说，文运与大学须臾不可分离，五四时期的“生机”“反抗”“勇敢”“天真”在与大学分道扬镳之后极速坠落，遭遇到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压迫，影响力骤降。沈从文认为，民国十八年之后的文运正是由于与大学分离而没能产生期待中的效果。因此，沈从文强调必须把文运置回到大学中间。“重新建设一个观念，一种态度，使作者从商场和官场约束中走出，依然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19]300}同时借助文艺副刊这一媒介，将年轻作家创作的蕴含五四时期美丽因子的优秀作品全面传播，在读者心灵深处植入理想 and 希望。

在后五四时代的中国，新教育催生出诸多新

青年,大量的“无名作家”也由此诞生。他们冀望以创作为生,以文学为业,却因无名屡遭各类报刊(文学副刊)无视,投稿无门,怀才不遇,生命暗淡无光,成为难以安身立命的边缘知识人,初入北平文坛的沈从文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不过幸运的是,由于胡适、徐志摩、郁达夫等前辈文人、知名作家的赏识提携,沈从文最终时来运转,快速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坛的核心地带,并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多家知名报刊的主持人。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剧烈的身份转变,促使沈从文成为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史上传奇人物:刊发文章从来不拜名家,而是全力提携新人、奖掖后进,萧乾、汪曾祺等一大批后来负有盛名的大作家也因为当时他的精心培养脱颖而出。

综合而言,沈从文之所以倾心于培养、提携文坛的后起之秀,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青年作家,实际上饱含着他内心深处诚挚的“五四情结”和文学革命思想,寄托了他重造文学经典与民族品格,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怎样办好一份好报纸:从昆明的报纸谈起[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42.
- [2] 沈从文.编者言[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447.
- [3] 沈从文.记胡也频[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8.
- [4] 沈从文.答凌宇问[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522.
- [5] 周定一.沈从文先生琐记[M]//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244.
- [6] 李端生.报刊情缘:沈从文投稿与编辑活动探迹[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80.
- [7] 严文井.谁也抹煞不了他的存在[M]//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132.
- [8] 沈从文.给李先生[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86.
- [9]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1902—1988[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72.
- [10] 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87.
- [11] 沈从文.致柯原先生[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475.
- [12] 沈从文.本刊一年[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454.
- [13] 沈从文.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77.
- [14] 沈从文.小说与社会[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04.
- [15]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
- [16] 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25.
- [17] 沈从文.致周定一先生[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18] 吴翔宇,任超.“精确”与“模糊”的辩证法:论袁鹰儿童诗的语言政治[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7(4):98.
- [19] 沈从文.纪念五四[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黄声波